
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面政权

朱德新

抗战时期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许多村政权都采取两面政权的形式，它一面用以应付敌人，一面作为纽带，把共产党、抗日武装与广大农民紧密地连结起来，在艰苦的抗日年代起了重要作用。

冀东两面政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

1938年7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摧毁了该地区的敌伪乡村政权。但由于起义部队未迅速建立抗日政权，以致在暴动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冀东农村成为没有政权的“真空”地带。有的回忆录分析说，如果当时建立农村基层抗日政权，并有计划地留下整顿好的武装坚持斗争，起义部队后来便绝不会招致那样大的损失。^①

冀东为东北通向华北的走廊，地位重要，“敌人对冀东的注意，也超过于华北的其他地区”。^②日本一直在此投入重兵。鉴于冀东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相持阶段中冀东八路军的劣势地位，后来彭真总结出这样的认识：“冀东的环境是异常艰苦的，绝不可能创造出象北岳区或冀中平原同样的根据地。党对冀东游击战争坚持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应有足够的估计。”^③直到1944年11月，中共晋

① 参见王文：《冀东暴动的西部风云》，《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77—178页。

②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对于冀东工作的指示》，1943年3月25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下），第823页。

③ 彭真：《对冀东、平北工作的意见》，1941年8月17日，同上书，第532页。

察冀分局致冀东区党委电中还指出：由于处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冀东抗日斗争对敌威胁最大，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和残酷，不仅建立与坚持根据地方面比其他地区有更多的困难，即在将来全国反攻、华北反攻的局面下，冀东形势的基本变化还可能比其他地区晚，还可能经过一个较大的困难残酷时期。因此，对冀东的困难局面应比其他地区作更长远的打算。^① 这种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在冀东地区，日伪一直实行“梳篦清剿”、“三光”、“囚笼”政策，强化保甲与连坐，以“集家并村”来制造“千里无人区”。1944年7月，日军又将冀东划为特别行政区，实行“军管制”，并派出相当于一个师团的伪满军和十多个警察大队进驻冀东，配属原驻此地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和华北特种警备队，对抗日力量展开更为猛烈的“奔袭合击”。

与敌伪相比，冀东抗日武装始终处于劣势地位。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后仅存武装3000余人，经过浴血奋战，到1941年春才发展到7000多人，开辟出初具规模的游击根据地。^② 但因当年夏天敌人“扫荡”，又遭到很大损失，游击根据地几乎全又变成游击区。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建立抗日村政权极端困难。但如果放弃建立抗日村政权的努力，单纯由八路军开展地方工作，抗日武装就只能浮游于各地，重蹈1938年暴动失败的覆辙。于是，冀东共产党组织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建立两面政权的策略，即在敌伪基层政权外壳内加进抗日的成份，利用保甲制度的形式为抗日服务。

两面政权政策，适合冀东农村的实际情况。游击根据地开创初期，甚至基本群众对共产党或八路军也还抱有怀疑态度。所以，利用乡保长们去接近群众或用他们的影响去联系群众，是打开局面的较好途径。这符合共产党的“利用上层，开辟下层”的方针。而且，为了在敌人占领的情况下能敷衍敌伪，也需要利用伪乡保长应对

①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冀热辽工作的意见》，1944年11月2日，同上书，第951页。

② 其中主力部队4000多人，县区游击队3000多人。转引自李运昌、李中权、曾克林：《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108页。

官府的经验。大部分伪乡保长的爱国之心并未泯灭。他们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为敌办事,是为了保全自身利益,他们同时也尝受到亡国之苦,对敌人的欺压怀有怨恨。这是“两面政权”建立的基本条件。当然,伪乡保长也有动摇的一面,抗日力量必须花极大精力去争取他们。否则,他们倒向日伪的危险会随时发生。

抗战初期,刘少奇在总结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经验时分析,有些地方的村干部和民众在无抗日军队保护的情况下,被迫顺从日寇,担负日伪勤务,这不当禁止,更不能把他们当成汉奸来处置。我们的游击队只能向他们取得在情报、购物、带路、送信与掩护宿营等方面的帮助,同时还应替他们保守暗中抗日的秘密,以免其遭敌人的摧残。所以,中共在敌后的工作,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斗争方法。^① 利用保甲制度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办法。

1938年11月冀东抗联领导人李运昌在迁安县柳沟峪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恢复地方工作,会后,谷云亭到丰润县皈依寨村推行在保甲体系内安插办事员的制度,作为建立抗日两面政权的试点。共产党在有的村庄,是利用“维持会”瘫痪之机,秘密推举办事员为村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另找一名有能力的农民出面当保长,与日伪打交道,以此来取代“维持会”。^② 有的地区则对乡保长采取了团结、争取与孤立打击相结合的方法,以便在保甲制度内秘密添加办事员。据李运昌回忆:此时的办事员是两面政权的雏形,它和“后来我们统称的村办公人员的办事员不同,这是隐蔽发展的第一步。这个办事员实际是我们的代表,让他参加到旧政权里去,使旧政权为我们工作,逐步改造成‘两面政权’的性质。这才能从根本上把敌占

① 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政策问题》,1938年2月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35—436页。

② 参见杨文汉:《丰滦迁联合县的创建和发展》,《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158—159页。

区变成游击区,然后变成游击根据地”。^① 1940年12月,中共冀东区党委在蓟县盘山开会,决定普遍建立办事员制度。

办事员制度的优点是简单易行,建立后便可开展工作,新开辟的村庄有一个秘密做抗日工作的人,群众马上增加了对共产党的联系。但当抗日力量增长后,有的地方出现办事员凌驾于伪保长之上,办事员与旧办公人员严重对立的情况。有鉴于此,1941年8月,中共冀东党组织在张屯会议上规定:加强对办事员的管理教育,将雇用的不能起作用的以及成份太差的办事员撤换;建立中心村,成立办事员小组。^② 实行这些办法,使办事员的素质和工作水平大为提高。

随着形势的发展,有的地方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后,便以村政委员会制度来代替办事员制度,彻底废除保甲制。村政委员会视村庄的大小,一般由5—7人组成,设民政、财经、教育、调解、敌工委员。委员中包括原办事员、各群众团体代表、开明士绅以及倾向抗日的原敌伪保甲人员。但办事员制度是敌强我弱环境的产物,如果不顾客观条件过早地实行村政委员会制度,也会给抗日斗争带来不利的影晌。处在敌人的长期包围中,公开废除保甲制,很容易暴露抗日力量,引起敌人的报复。如昌东联合县在1944年夏天建立了270余村的村政委员会,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条件并不成熟就急于建立的,结果“刺激了旧的统治层或统治人物,造成新旧力量某种程度的对立,而且容易暴露给敌人(已经暴露),易使敌人按图索骥,而受到打击”。^③ 加之敌人派遣奸细乘我方改造政权之机制

① 中共丰润县委党史研究室1961年8月17日在北戴河访问李运昌记录,原件存中共丰润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第10卷。

② 据刘欢等当时的办事员介绍,他们属中心村的办事员直接领导。当时有的地方未建立办事员小组,而是建立以中心村为核心的片区抗日领导机构。(1991年10月14日在遵化县西三里乡小刘庄采访刘欢等人的记录)。

③ 《昌东联合县县务会议决议》,1944年5月25日。转引自李天林《抗日战争时期乐亭县对统战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共乐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乐亭县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二),第117—119页。

造矛盾,争夺农村上层人物,导致了部分旧政权人员“背我向敌”。^①针对这一严重情况,昌东联合县党组织商讨对策决定:1,除个别村庄外,立即停建村政委员会;2,已建立的村政委员会由村政权转变为村政权的参议组织(扩大民意,监督村旧办公人员);3,对亲敌的两面政权,要用交朋友的方法,逐渐造成其与敌伪离心的倾向;对抗日的两面政权,要教育其成员提高警惕,防止被敌特拖入陷阱。^②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并适时地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敌特斗争,昌黎、乐亭基本上变成游击根据地,两面政权在冀东得到了稳步发展,且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③

对共产党在冀东建立两面政权的这段历史,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4年春天作过分析:“中共鉴于1940年以前军事抗战战略的失败,于是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攻势’,采取使新政权(指日伪建立的政权,以下同——笔者注)两面化的政策。对公务人员、武装部队和治安地区农村及其自动放弃的农村旧根据地进行抗日赤化的工作。中共此种战略的目的,显然在于加强‘利用新政权充实抗战力量’的程度,使新政权在平常执行政务时,形成抗战的外围力量,以弥补自身独立抗战力量的不足,而在所谓‘总反攻’时,要使新政权的部队、公务人员与民众成为‘反攻友军’。”^④这大致符合冀东两面政权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中共这一政策的成功。

二

两面政权的最重要特点是利用合法形式暗中开展抗日斗争。

① 《昌东联合县县务会议决议》。

② 前引李天林文,《乐亭县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二),第119—120页。

③ 笔者于1991年10月,1992年5月两次走访冀东5个县的农村(即北部山区遵化、迁西县,中部平原丰南、丰润县,南部沿海昌黎县)中曾任办事员、武装班长、财粮委员、青年报国队队长的人,他们均认为办事员制度一直持续到抗战末期。

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译版,第391页。

冀东两面政权,把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生动的范例。

在对敌负担方面,两面政权采用了一套灵活的手段,既“胡弄了鬼子”,达到拖欠、少交或不交的目的,又使敌人找不到报复的借口。具体作法是,在青纱帐时节,对据点进行一段时间的困扰和封锁,使敌人无法出来抢粮,又给敌人造成农民无法入据点去交粮的假相。事先埋伏在送粮途中的八路军游击队朝天放枪,保甲长“惊慌失措”地进据点,向敌人报告粮食在半路给八路军截走了。^①有的则干脆在驴背上驮一条破口袋,里面装少许粮食,赶着驴到据点报告道:“路上遇到八路的埋伏,粮袋被子弹打穿,粮食都快撒光了。”^②有的保长在通往据点的路上烧了一些纸,抗日区政府的干部朝天放几枪,次日敌人来催款,保长说款在路上被八路军烧了,敌人见纸灰后无可奈何,只得作罢。^③保长有时还伴以说理抗交粮款。据载,一次昌黎县伪县长带人下乡催粮款,问某村保长,为什么不交粮款?这位保长说:因为人们说你们是为日寇服务的,所以不给。伪县长气得说不出话来。而就在此时,村外游击队在打枪,伪县长吓跑了。^④

两面政权利用合法身分开展对敌斗争。日伪南草场警察所所长刘秀石,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指使几个保长给刘送礼,然后写匿名信给日军,告刘敲诈民财。敌人传讯这些保长核实后,撤了刘的职。通过类似方法,抗日力量还巧妙地除掉了马兰峪警察庞志余等多名汉奸。^⑤昌黎县冯贯各庄秦志英,丰滦迁联合县西佑国寺村的张士荣,利用保长身分到城里或据点内为共

① 1991年10月18日在迁西县白庙子村访问原办事员谷世荣的记录。

② 1991年9月9日在南开大学访问原八路军干部姜平的记录。

③ 前引李天林文,《乐亭县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二),第115页。

④ 高歌之:《开辟滦东》,中共迁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烽火漫天》第3辑,第72—73页。

⑤ 李建华回忆、李永春、张永生整理:《在魔窟里战斗》,遵化县政协编:《遵化史话》第3辑,第18页。

产党弄出敌人严密封锁的军用物资。卢龙县榆林甸乡伪大乡长刘老恩经常到敌人据点策反伪军,他手下的18个保长,有14个暗中抗日。^①共产党还在伪政权内物色情报员,向敌人送假情报,为抗日政府送真情报。1942年12月18日凌晨,大贤庄保丁兼情报员张树旺,接迁卢抚昌联合县办事处主任高敬之的指示,往建昌营据点送“平安无事”的情报,在凉水河边发现日军后,立即向八路军十二团团长曾克林报告。正在吃饭的八路军立即抢占后背山,经过激战,全歼建昌营据点山本中队的日军50余人。^②各地两面政权中,按其抗日程度差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敌我两面应付政权。它们一般在敌人据点附近,敌人兵力强,八路军不能公开活动。这种政权的特征是两面支应,以求生存,共产党来也能征粮款。如丰滦迁联合县十区以及沙河驿以南的地区、唐山北边的东西缸窑等地,就是这种情况。

一类是带伪装的抗日政权。它们处于离敌人城镇或据点较远的地区。村政权一般由两大系统组成,一为保甲长、户籍员、情报员、保丁,属敌伪系统(公开的);一为办事员、武装班长、财粮委员,属抗日系统(秘密的)。这种政权的特征是假意应敌,真心抗日。当敌人包围村庄要粮催款或搜捕八路军、游击队和抗属时,保甲长出面应付,办事员或隐蔽,或充作保丁与保长共同出面应付,借以了解敌情。这些村庄表面上看似保甲长掌权,实权由办事员掌握,如丰润县城到滦县县城公路以北的地区就是这样。^③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有的乡保长被共产党争取过来,完全站在抗日立场上,成了秘密的共产党员或抗日积极分子。只是在敌人来时,他们向其交

① 由于日寇实行“大联乡制”,对伪大乡长控制严密,共产党对伪大乡一般采取摧毁的方法,“两面政权”仅存在于保(村)一级,但有的伪大乡(镇)长被抗日力量争取过来,该伪乡公所也就变成两面政权机构。

② 据刘绍友、刘松涛访问高敬之等人和参阅有关史料整理而成的《迁安境内的情报站》,载《烽火漫天》第5辑,第98页。

③ 前引杨文汉文,《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159—160页。

纳一定粮款，也派人应差出工借以求得全村百姓的安全。此外一切工作均是支援抗日队伍。本文着重论述这类两面政权。

在两面政权内部还出现了两面性武装。

1941年春至1942年底，日军在冀东发起了两次“治安强化运动”，曾一度迫使有的抗日部队退出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日伪在那里组织了“反共自卫团”（以下简称自卫团，它又称“伙会”，“棒子队”，“棍团”）。有的自卫团是原民团、联庄会等民众自卫武装改编而成的。自卫团建立之初，游击队地下工作人员发动群众抵制，导致一部分村庄惨遭日寇血洗，使那里的抗日活动一度陷入困境。1942年12月，中共冀东地委决定改变抵制自卫团的作法，采取争取、分化、瓦解的政策，设法掌握其领导权，使其“变为敷衍敌伪，实际抗日的群众组织”。^①具体措施是：让那些未暴露身分的党员或抗日干部以个人身分加入，或让村中原有的青年报国会会员集体参加。青年报国会是冀东党组织的抗日团体，由其中骨干组成武装报国队。同时，青年报国会还用大量事实揭发自卫团中那些效忠于敌人的头目的罪行，使其孤立，争取自卫团的一般成员真心向着共产党。对坚决站在敌伪立场上的自卫团则由八路军消灭之。通过不懈努力，敌人对自卫团的指挥失灵了。此后，两面政权村庄的多数武装报国队“一身二任”，即对敌以自卫团的面孔出现，实际上却做武装报国队的工作。例如：日伪要求自卫团鸣锣敲钟报警，被共产党用来为八路军传递消息；戴自卫团臂章，拿白腊杆站岗放哨的青年，实际上为抗日人员作警戒；自卫团大张旗鼓地出动，名为搜捕共产党，实际上却是为抗日人员通过封锁沟做掩护；有的村还出现自卫团痛打冒充八路军的特务汉奸。这样，两面政权的武装亦具有了两面的属性。

经济上的两面负担，是冀东两面政权的一个显著标志。对敌负

^①《冀东地委关于对伙会政策指示》，1942年12月1日，中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迁西县革命斗争史料选》（二），第352—353页。

担方面,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伪乡保公所的办公费和伪办公人员的雇佣费、车马费,“治安军”、自卫团、情报员的各种开销等。对抗日方面的负担,主要是粮食、鞋袜、慰劳费与招待费,办事员和武装班长的津贴,支付各村情报员的费用,村干部开会的吃粮等。

从对敌我负担数量的比较看,一般地说,离敌人据点近的村庄对敌负担重;离据点远的村庄对我负担重。没有进行对敌斗争的村庄,对敌负担重;对敌斗争开展得较好的地区对敌负担相对轻。从对敌我负担占群众总收入的比例看,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因敌我力量对比等外部环境不同,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从对敌我战勤项目的内容来看,对八路军负担的项目主要有人力、畜力、制作衣鞋等。例如,遵化县东新庄在1944年曾出动1万多人次,400多车、畜次为抗日力量运输。大安口村曾一度每月对抗日方面出工1440个,占全村出勤人数的50%。另外还有送信(每村需2—3人负责)、站岗放哨以及情报人员。妇女的任务主要是为子弟兵承做服装、鞋袜、大衣、棉被、粮袋、子弹袋等。对敌战勤负担主要是为敌人挖壕沟壕、修堡垒、筑公路、埋电线杆等。如兴旺寨村民被敌人驱赶在村北挖“防共沟壕”,一度每天出劳力100多人。大安口村对敌承担战勤人数占其总人口的58%。^①在对敌战勤负担中,抗日干部也创造出对敌斗争的艺术。以挖“防共沟壕”为例,有的县召集武装班长开会,制定磨、拖、迟去、少去和早回的办法抵制。抗日游击队还用打冷枪,农民听枪声后一哄而散的怠工办法。^②这样既打乱了日伪的计划,又使敌人找不到报复的借口。

三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我残酷斗争中产生的冀东两面政权,在对

① 《遵化党史资料》第2辑,第111—112页。

② 1991年10月25日在丰润县皈依寨村访问原武装班长吴国兴的记录。

敌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它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免遭摧残,并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抗战。大部分保长能够严守规定,在应付敌人时不暴露抗日人员及其家属,保守隐藏抗日物资的地点,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他们有时还花钱疏通敌人,避免了敌人对村庄的烧杀劫掠。两面政权在办事员、武装班长的组织下,广大青年农民积极参军,为八路军补充兵员。以坚持滦东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为例,1942年它开到此地时仅1300人,一年后消耗了900人,但由于群众踊跃参军,它始终处于超编状态,到抗战结束时达1800人。^① 两面政权对八路军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援也很大。两面政权建立前部队给养要靠八路军自筹,或用武力强迫保甲长送。当抗日部队被敌人逐至深山或长城以外时,便立即失去后勤保障,陷入困境。两面政权建立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后勤供给体系和菜金制度,再利用合理负担方法作摊派,较好地处理了残酷斗争环境中的物资供应问题。抗日武装转移到深山时,也有办事员筹集粮款秘密送到战士手中。除钱粮外,有些两面政权村庄组织妇女为八路军制作衣服鞋袜。据回忆,仅1940年,遵化县的妇女就做鞋39万双,军衣、军被8.5万件。^②

两面政权建立后,使八路军有了相对安全的栖身地,得以对瞬息万变的敌情应付自如。日军5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一些抗日人员在两面政权干部的掩护下才得以幸存。当抗日人员遭敌围追时,“两面保长”冒着生命危险出面与敌周旋,用金钱、吃喝、送礼等方式支应敌人,甚至甘愿受敌酷刑,帮助抗日人员逃离虎口。抗日人员身陷囹圄时,他们用金钱多方疏通,利用自己的地位与社会关系请求以及联名具保等方式将这些人救出来。在两面政权的掩护下,八路军在冀东大地扎根成长,开辟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战场;在敌

① 前引高敬之文,《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324、323页。

② 刘连喜:《遵化县1940年抗日群众团体的建立及其事迹》,《遵化党史资料》第2辑,第45页。

人制造的“无人区”内，抗日斗争也从未停止。对此，就连冀东日军的顶头上司冈村宁次也看出：“八路军的势力表面上似乎看来平静，实际上一揭开表皮就露出红色的实质。”^①

村庄两面政权在抗日县区政权的统一布置下，还积极配合对敌武装斗争。村武装班长率武装报国队员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例如迁青平联合县一区西水塔村李俊福，张家店村祝春荣等武装报国队员，累计在喜峰口至洒河桥的公路间割电线千余斤，砍电线杆近百根，挖壕沟多处。他们放火烧毁洒河大桥，造成日军联络中断，指挥不灵。据不完全统计，仅迁西县境内的武装报国队就有1500余人(次)参加了上述活动。^②武装报国队还积极参加了粉碎日军“沟壕堡垒”阴谋的活动。迁卢青联合县二区武装报国队员60人，一夜间平毁敌人的壕沟30里。有的地区，白天保长带队，给敌人挖沟，夜间再带人填沟，推迟了敌人“沟壕堡垒”的完成时间。此外，武装报国队还配合八路军开展了无数次正面攻坚战斗，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冀东的抗日县区政府流动隐蔽，一切具体工作均靠各村两面政权完成。连日寇也察觉到，这种两面政权“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共进行援助，有不少公开通敌(指八路军——编者注)供给敌人物资武器的情况”，“中共现有抗战能力，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都在极大程度上依靠和利用新政权。”^③

群众称两面政权是“贼不偷的杏——表面青，里头红”。它是抗日游击战争中创造出来的对敌斗争方式。它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冀东广大农村站稳了脚跟，大大便利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① (日)铃木启久：《制造“无人地带”》，转引自《遵化党史资料》第2辑，第383页。

② 王宝钟：《两次大破击》，《迁西县革命斗争史料选》(二)，第142页。

③ 《华北治安战》(下)，第392—393页。